

位与非位范畴及其跨学科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人文和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珠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黄行

提要：区别“音位的”（phonemic）和“语音的”（phonetic）是语言学研究最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这两个术语的后缀-emic 和-etic（语言学译为“位/非位”）也被用于人类学和民族学（译为“主位/客位”），指研究者是（从内部）用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去解释他们自己的文化，还是（从外部）采用通行的文化概念和术语对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这对语言学和民族学平行的范畴和研究方法，还衍生出（观念上的而非时间上的）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语言普遍性和文化普世性、语言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等跨学科的学说。

一 位/非位——主位/客位（emic/etic）

术语 emic/etic 是美国暑期语言学院（SIL）语言学家肯尼斯·派克（Kenneth Pike）于 1954 年首次推出的，他认为语言学家开发的这种描述语言行为的工具也可以适用于任何人类社会行为的分析。（Kenneth Pike, 1954）

1.1 语言学的位/非位

语言学的“位/非位”（emic/etic）分别来自“音位的”（phonemic）和“语音的”（phonetic）的后缀。具体是指同样物理和生理属性的语音在不同语言中的“位/非位”功能和地位可能是不同的，只能根据具体语言的语音系统来确定。

例如辅音的清浊和送气与否。古代汉语的辅音是分清浊的，现代汉语普通话和诸方言的浊音多已清化，辅音的主要区别特征已由清浊转换为送气与否；而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例如蒙古语和满语），虽然多数语言物理上的浊音也已清化，但是在音系上仍分清浊，即浊音读不送气清音，清音读送气清音，也即物理上的清浊已由送气与否所取代，但是音系上或心理上的辅音主要区别特征仍为清浊而非送气与否；印欧语的辅音也存在物理上的清浊和送气与否，即浊音气流弱，清音气流强，但是在音系上，主要区别特征还是清浊，送气与否可以忽略不计。描写具体语言音系时，语言学家需对某客观存在的语音单位，根据母语人的主观语感判断其是否具有音位学或音系学地位。“位/非位”对于母语人的语音感知是明显不同的，即如赵元任先生所说，具有音位区别的特征差别再小母语人也能辨别，不具有音位区别的特征差别再大母语人也不易辨别。（赵元任 2003）

这对术语用来代表研究语言学数据的两条对立的路子。“非位”的路子是对语言的各种物理模式加以描写，尽量不考虑它们在语言系统中的功能。相反，“位”的路子充分考虑各种功能关系，建立一个由抽象对立单位组成的封闭系统作为描写的基础。（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 2002）

可见，语言的“位/非位”描写都是必要的，不同在于侧重描写语音在具体语言系统中的功能还是侧重描写语音超语言的物理模式。如上所述，声学四要素“音高、音长、音强、音质”普遍存在于人类语言的语音，但是它们在不同语言中“位”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从超音段特征看，汉藏语系语言属“声调”型语言，阿尔泰语系语言属“重音”型语言，无论“声调”还是“重音”客观上都兼有音高、音

长、音强的物理区别，主观上“声调”型语言的“音高”具有“位”的地位，而“重音”型语言则选择“音强”具有“位”的地位。

1.2 人类学的主位/客位

同理，相同物理和生理属性的社会现象在不同文化中的“主位/客位”（emic/etic 在人类学中译为“主位/客位”）功能可能是不同的，也需要区分具体社会群体的文化系统还是超文化的泛化现象。

“主位/客位”是一对借自语言学的专用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术语。文化的“客位”研究类似于语言学的音素分析，研究者要站在被调查对象的局外立场，采用通行的文化概念和术语，对所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即所谓“从外部看文化”的研究；文化的“主位”研究如同语言学的音位分析，是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研究者要用这个文化里特有的概念和术语来认识这一文化，用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去解释他们自己的文化，即所谓“从内部看文化”的研究。根据音位学原理，在相同的语言环境中，如果词中的一个语音替换为另一个语音后，引起了词在意义上的变化，如汉语/pai/（拜）和//phai/（派），那么这两个语音就是两个不同的音位/p/和/ph/；反之语音替换以后，未引起一个词意义的变化，如英语/pai/和/phai/（馅饼），那么这两个语音就是同一个音位/p/。语音能够成为音位，并不是由于它们存在客观上的不同，而是因为母语者在以一个语音替换另一个时觉察到了其中的主观“区别”。派克将此音位学的原理引申为人类学的主位引导操作（eliciting operation）：当一个事件 E1（相当于语音中的一个音）在行为流中发生，人们对该事件的反应不同于对事件 E2（相当于语音中的另一个音）的反应，那么 E1 和 E2 便具有主位意义上的不同，反之则只有客位的意义。派克引用的例子如，早餐中橙汁通常先于谷类食品端上，或者在宗教服务中的奉献盘总在布道之后端上。

也有人类学家这样定义主位-客位的含义，如拉乌尔·纳罗尔（Raoul Naroll）通过参考具体文化与泛文化概念的差异性，将主位与客位界定为：“主位是对具体文化中的特有概念的研究，而客位则是为普遍的泛文化研究而进行的概念研究”。

（Raoul Naroll, 1973）

我国民族学界近年来十分重视文化现象的“主位-客位”研究。例如云南大学沈海梅教授一篇讨论人类学“主位-客位”和“社会性别”的报告，根据苗族、彝族、傣族等女性较之男性更少通汉语、更多穿着民族服饰、更多参加传统宗教活动、更多传统工艺的传承者和表演者，而得出男性更客位化与女性更主位化的社会性别差异的结论。（沈海梅 2004）

1.3 位/非位与主位/客位的对比

“音位”和“语音”的区别是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因此对语言研究来说是必须掌握的基本范畴和方法，似乎没有特别需要强调之必要。但是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中，其方法论的重要性要超过在语言学中的地位。民族学对“主位/客位”的作用和评价也不同于语言学。例如，主位研究的优点是“能够详尽的描述文化的各个环节，克服由于观察者的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偏差”，缺点是“由于当地人在自身的文化当中可能会将许多的行为和思想视为当然的和平常的”；客位研究的优点是“研究者可以认识和解释那些本土文化中生活的人们在自身文化中可能视为当然的和平常的许多的行为和思想”，缺点是“不能详尽的描述文化的各个环节，观察者会因为文化的差异、文化假设上的偏差而产生可能错误的认识”，因此客位研究是“以科学家的标准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用比较的和历史的观点看待民族志提供的材料”。（黄平等 2002）

与人类学客位研究强调“以科学家的标准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用比较的和历史的观点看待民族志提供的材料”不同，语言学的“非位”研究倾向于语音的物理属性和跨语言的普遍性研究。现代语音学研究中的声学实验已经成为必要的手段，充分的具体语言的音系描写一般都要附上某些语音现象的声学参数图，即是物理的“非位”是对心理的“位”的必要补充。

语言学“位”的研究虽然尽量按照母语人的发音和语感归纳语言系统，但是实际上语言学家是无法彻底做到从调查对象的母语感出发归纳其语言的系统，而会融入调查者母语背景的影响。例如藏缅语的声调比较晚起且不稳定，汉语学者倾向将其分析为汉语型的“声调”（tone）系统，西方印欧语学者往往倾向将其分析为印欧语型的“音高-重音”（pitch-accent）类型。

四川凉山的史兴语按中国学者的归纳描写有 4 个字调：55、33、53、35，（黄布凡 1991）西方学者认为史兴语不仅有单音节词调，还有多音节词声调（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声调均为/H/高、/L/低、/HL/高低三个调），该语韵律域的重音默认在首音节，首音节声调延伸至后面的音节，重音位置离默认位置越远，词汇调中立化越大。（齐卡佳 2007）

语言的“位”强调母语人的主观认同，但是有时母语人的认同也会有分歧。例如关于蒙古语的“重音”，传统蒙古语言学教科书认为，蒙古语词重音是固定在第一音节上的音势重音，而事实上蒙古语词的音强、音长和音高情况错综复杂，简言之即物理的或“非位”的词首音节为长元音的词第一音节最强，词首音节为短元音的词非词首音节较强。一项对蒙古族被试实际的或“非位”的音强、音长、音高都在第二音节的双音节、三音节词的听辨实验结果表明，一些蒙古语文专业的学生仍坚持认为“位”的重音在第一音节，可能是因为他们受到传统蒙古语言学知识的影响。（呼和 2007）维吾尔语也有“位”的词重音，但是声学实验证明，“非位”的物理音长比音强对“位”的重音的优势和贡献更大。（江海燕、刘岩、卢莉 2010）

因此，“位/非位”和“主位/客位”的共同之处是不同语言或不同文化对区别（distinct）信息和冗余（redundancy）信息的选择，相同的语言或文化现象在某种语言或文化中是“位/主位”的区别性信息，而在另一种语言或文化中可能是“非位/客位”的冗余性信息。

“位/非位”和“主位/客位”现象还可以引申出（观念上的而非时间上的）一系列相关的诸如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语言普遍性和文化普世性、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遗传多样性等跨学科的理论问题。

二 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论

与“位/非位”和“主位/客位”都强调语言或文化的差异有关的理论假说即语言相对论与文化相对论。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也是同出一源，均肇始于 18 世纪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的思想，（姚小平 2005）受其影响语言人类学家博厄斯在其所著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Boas, F., 1911）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不同语言对客观事物的范畴化差异。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由此发展出“语言相对论”，同是博厄斯的学生 M. J. 赫斯科维茨亦由此发展出“文化相对论”。但是它们的动机和着眼点很不相同，当前学科的评价和关注度也很不相同。

2.1 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sm）

该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结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此一种语言的范畴和定义分类系统为该语言系统所独有，与其他语言的范畴和定义分类系统不同。

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思维都是通过母语来进行的，即语言中有什么样的范畴分类系统，对客观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认知范畴。语言相对论最早是从颜色词认知问题研究开始，（Berlin and P. Kay, 1969）也称“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但是由不同语言造成的世界观的差异已经证明极难阐释或用实验验证，成功的双语翻译这一事实也削弱了这种理论主张的力量；结果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对当代心理语言学没有产生多少影响。（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 2002）

即是说“语言相对论”目前仍缺少实证或实验研究的支持，因此该假说的提出并未对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近年来，一些探讨不同民族阅读障碍效应的神经语言学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如实验可以证明汉语和英语正常阅读者的脑区激活模式不同，但汉语和英语的阅读障碍有着相同的脑区激活模式。（杨亦鸣 2012）

此外，从语言普遍性的角度也可以证明，语言相对性或多样性并非无限的，而是有其变异的范围和限制的，也是对“语言相对论”偏颇性的反驳（见下文）。

2.2 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sm）

这种理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个性。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文化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不能用普遍、共同、绝对的标准去衡量一种文化的价值；也不能以调查者自己群体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其他民族的行为方式，特别是不能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我族文化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观念做标准。

“文化相对论”是涉及文化价值判断的方法和理论，构成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思想，其地位远远超过“语言相对论”之于语言学的影响，视角也和语言学明显不同。该理论的价值在于是对 19 世纪西方“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动，主张平等尊重多样性文化的存在，例如文化权的保存意识、道德相对论等。当然，如同“语言相对论”存在质疑一样，“文化相对论”也受到诸如人权观念等普世价值的挑战。“捍卫文化多样性要求人们必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尊重少数人群体和土著人民的各种权利。任何人不得以文化多样性为由，损害受国际法保护的人权或限制其范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

三 语言普遍性与文化普世论

“位/非位”和“主位/客位”或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强调的是语言或文化的差异方面；同时，语言和文化也都有其共性和普遍性的方面。

3.1 语言普遍性（language universals）

根据语言相对论，世界上不同语言的结构千差万别，但这种变异不是任意的和无限的。现代语言类型学研究人类语言的结构变异，试图确定这些变异所受的限制并作出解释。类型学研究语言普遍性，是依靠跨语言类型差异的对比发现语言的共性规律，因此重视具体语言个性差异的研究，通过语言的普遍性来解释语言个性差异可以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语言普遍性特别强调语言的蕴含共性，即语言相对论所强调的语言特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历时类型学是类型学研究的进一步扩展，它探讨跨语言的普遍模式是否制约语言类型的演变以及语言演变过程中的类型分类和各种关系，即假设古今语言都遵守共同的普遍性规则，是历史语言系统构拟不可缺少的方法。

以颜色词研究为例，看语言相对论和语言普遍性的关系。尽管根据语言相对论，不同语言颜色词的范畴和数量差异极大，但是颜色词的分布和排序却呈现出超语言的等级共性，即：

黑/白>红>黄/绿>蓝>棕>紫/橙/粉/灰

这个分布顺序是指，凡有某颜色词的语言，必然也有其左边的任何一个颜色词，但是未必有其右边的颜色词。如只有两种颜色词的语言一定是黑和白（或冷色和暖色），三种颜色词一定是黑、白和红，四种颜色词则为黑、白、红和黄/绿，……。如汉语的“五色”（青、黄、赤、白、黑）以及我国所有少数民族语言的颜色词皆符合此分布顺序。（黄行 2011）因此颜色词在语言和认知系统中并非任意分布，而是有其深层共性机制的，即越靠近左侧的颜色词等级（hierarchy）越高、越无标记（unmarked），在语言中的分布越普遍，越容易被范畴化。

颜色词的这种分布特性相当于语言的蕴涵共性（implication universals），即有标记（marked）的参项蕴含无标记参项的存在，但是无标记的参项未必蕴含标记参项的存在。因此蕴含共性是研究语言共性或普遍性是基本范畴。例如据一项对 564 种语言样本的类型学研究，人类语言的元音数量差别很大，有 93 种语言只有 2~4 个元音，288 种语言有 5~6 个元音，183 种语言有 7~14 个元音。

（Martin Haspelmath 等 2005）我国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元音也呈类似的复杂分布状态。这种看似异常复杂和多样的元音系统实际却受语音蕴涵共性，即 a>i>u>e>o>……的等级分布顺序的制约。这个等级分布顺序是指，只有 3 个元音的语言必然是 a、i、u，4 个元音是 a、i、u 加 e 或 o，5 个元音是 a、i、u、e、o，6 个元音是 a、i、u、e、o 加 ə、ɾ、ɯ、y 等中的某个，7 个及以上元音的语言依次类推。换言之，有此序列右边的元音，必有序列左边的元音，但是相反的蕴含关系却不存在。元音的蕴含共性还可以证明，复元音蕴含单元音，长元音蕴含短元音，舌尖元音蕴含舌面元音，鼻化元音蕴含口元音，翘舌元音蕴含平舌元音等，而它们相反的蕴含关系也都不存在。因此语音蕴涵共性的制约，将极其复杂多样的元音系统统一起来。此例所举元音的蕴含共性也普遍适用于语言的语法（如名词的格范畴、动词的时体范畴）、词汇（如词源和构词法）的多样性制约关系之中。

3.2 文化普世论（universalism）

文化普世论认为，现代人类学的基础之一就是关于人类的普世性认知，即世界上现存所有的人类都是同一种属，任一人群都不比其他人群更为进化。文化相对论与文化主位研究反映的是文化的独特性方面，但是文化也存在超文化的人类普世的共同性或普遍性，存在超文化超民族的人类所共有的行为特征的价值取向。

文化普遍性一个比较典型的话题就是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例如作为秩序概念的道德是相对的，作为原则概念的道义是普遍的。道义能够将完全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群相互联系在一起，并且为各个族群、民族与国家提供众所认同的普世价值。如上所述，人权是道德权利，它属于道义的范畴，无疑具有普世性意义。又如中国传统的“和”文化与普世伦理的关系，“和”文化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些人类共同的道德范畴，更在于指出了正确处理文化差别、道德差别的恰当方式，这就是“和而不同”的原则。

可见文化普遍性或普世论的讨论仍停留于思辨的阶段，并未涉及文化相对性和文化普遍性的联系，而语言普遍性则是通过实证方法从语言相对性推演出来的。

四 语言多样性与文化、遗传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和相似的功能，甚至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这种联系和功能在国际组织的文件中被描述为“它透漏出生命多样性是由自然、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4.1 文化多样性

2005 年 10 月第 33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关系密切，“保护区语言学应该和保护生物学齐头并进。研究者们不仅仅在探索他们的平行发展，而且在摸索世界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以及各个层次的多样性丧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就意义重大，因为它透漏出生命多样性是由自然、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构成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象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1）

因此，《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1）要求各会员国为促进宣言的有效实施，在以下语言目标方面展开合作：

保护人类的语言遗产，鼓励用尽可能多的语言来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

（第 5 条）

提倡在尊重母语的情况下，在所有可能的地方实现各级教育中的语言多样化，鼓励自幼学习多种语言。（第 6 条）

促进数字空间的语言多样化，鼓励通过全球网络普遍地利用所有的公有信息。

（第 10 条）

语言、文化和基因多样性的普遍联系也表现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和沟通方面。

4.2 遗传多样性

在人类的线粒体基因组和 23 条染色体组成的核基因组中，能为分子人类学研究提供重要信息的主要是线粒体 D-环控制区和 Y 染色体 DNA。具体来说，线粒体 DNA 具母系单倍体遗传特性，所以后代的线粒体 DNA 只能来源于母系，经过许多世代都不会发生改变，因此根据线粒体 DNA 序列构建的系统发育树可以很好地反映人类的母系迁移历史。著名的“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理论，即是通过通过对居住在世界各地的 147 名现代人胎盘线粒体 DNA 序列分异度的研究提出的。因为现代非洲人群线粒体 DNA 比其他大洲人群具有更丰富的遗传多态性，说明现代非洲人是一个相对古老的群体，比其他人群拥有更长的积累线粒体遗传变异的时期，因此现代人的共同祖先是一个 28.5-14.3 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女性，为人类起源中的“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直接证据。Y 染色体遵循严格的父系遗传路线，通过对 Y 染色体的进化及 Y 染色体 DNA 多态位点的分析，可以揭示某个民族或某个特定地理区域人群的父亲历史和分化时间。

遗传多样性对于人类起源的意义在于，非洲在地理位置上和全球其他地方的距离与该地区人类的遗传多样性有关，离非洲越远，遗传多样性越少。由此推论，人类在离开非洲后，一些基因在迁徙的路上渐渐丢失掉了。随着距非洲距离越来越长，遗传多样性的衰退程度，正好沿着人类早期迁徙的路线慢慢增大。如果人类起源于不同地区的话，就不可能有这样严格的规律。（盛桂莲、赖旭龙、王颀 2004）

4.3 语言多样性

有学者参照以基因多样性分布证明相距人类起源地迁徙距离的方法，试图用语音多样性的分布差异来探索语言的起源问题。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学者阿特金森根据世界上 504 种语言音素数量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分析，发现语音多样性（phonemic diversity）和非洲距离之间存在强烈反比关系，即距离非洲越近，年代越早，语音多样性越呈上升趋势；反之距离越远，年代越晚，语音多样性越呈下降趋势，因此可以支持现代语言也是起源于非洲。（Atkinson QD, 2011）

2012 年 2 月 10 日，复旦大学李辉课题组与语言学家陶寰根据独立研究成果，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刊文质疑阿特金森的“人类语言起源非洲说”。（Chuan-Chao Wang 等 2012）2012 年 2 月 15 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头版对此做了报道。（李玉 2012）

复旦研究团队收集了全世界 95 个语系的 579 种语言资料，每隔一个纬度、经度选取网点，研究其语音的复杂度，详细分析其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发现以里海为中心呈普遍下降趋势，离它越远，复杂度越低。

人类基因起源于非洲和人类语言起源于亚洲的观点如何调和？该项研究认为，语音多样性的分布规律反映的实际上并不是现代人最初的起源过程，而更可能是发源于亚洲中南部的人类第二次大扩张。对人类 Y 染色体多样性分布规律对比分析表明，这次大扩张可能发生于 2~4 万年前，辐射到所有大陆，并回流到非洲，形成了现代种族的主体格局。（李玉 2012）

李、陶等文章所举语言多样性的具体实例包括元音的数量和声调的数量的语言分布。该文认为，日耳曼语族语言和中国吴方言是世界上元音最复杂的语言，语言大多有 10 个以上元音，其中以上海奉贤金汇镇的 Dôndâc 吴语为最，有 20 个元音；相比之下，非洲的语言很少有超过 10 个元音。再如声调，多数非洲声调语言不超过 4 个声调，而在亚洲大多数声调语言都超过 4 个，尤其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侗语声调最复杂，有 15 个调。根据对未经简化的 510 种语言所有音素原始数据的多样性分析，证明世界语言多样性明显在亚洲，其中语音多样性最高的三种语言是 Dôndâc 吴语（3.91）、侗语（2.87）和布央语（2.49）。

这里讨论语音多样性和语言起源问题有两个基本的假设，第一语音多样性是指音素的数量；第二同一种语言的多样性古今基本不变，或变化极其缓慢。但是，上文所举亚洲语言的元音和声调多样性分布似乎不能支持这两个假设。

关于元音多样性一般认为，语言中元音的数量取决于词的音节长度和辅音数量的多少。（Martin Haspelmath 等 2005）即词的音节长度越短，词与词之间的语音区别度较之多音节词降低，音节内的音素（元音和辅音）越复杂，反之词的音节长度越长词的区别度增加了，音节内的音素越简单；辅音系统简单的语言，元音系统比较复杂，以保持整个语音系统的平衡。东亚语言的元音复杂性符合上述第一项条件，即大多数东亚语言的词（词根）为单音节型，每个音节都有意义（如汉语表意的书写符号汉字都是单音节的），所以其音节内的元音（也包括辅音）较之多音节词型语言（如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语言）数量要多。但是从语言的

历史演变角度，东亚语言词的单音节型并非其早期形态，应该也是由人类语言比较原始的多音节词型转化来的，其主要证据是东亚典型单音节词型的侗台语，与典型多音节词型的南岛语同出一源，其同源词之间有整齐的语音对应规律，但是侗台语的元音相对复杂而南岛语的元音极其简单。因此没有证据说明，东亚语言的元音复杂和多样性是其远古的语音状态。

关于声调多样性，就目前所知研究成果而言，侗语的确是汉藏语中声调最多的语言，但是侗语的声调不仅产生的很晚，其声调形成与分化的过程也是可以清晰追溯的。侗语 15 个声调产生和分化的过程是：（石林 1991）

平	平	平	上	上	上	去	去	去	入	入	入	入	入	入
清	清	浊	清	清	浊	清	清	浊	清	清	清	清	浊	浊
—	—	—	—	—	—	—	—	—	短	短	长	长	短	长
—	送气	—	—	送气	—	—	送气	—	—	送气	—	送气	—	—
1	1'	2	3	3'	4	5	5'	6	7	7'	9	9'	8	10
阴平	阴平派	阳平	阴上	阴上派	阳上	阴去	阴去派	阳去	短阴入	短阴入派	长阴入	长阴入派	短阳入	长阳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上表逐行大致可以反映侗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过程和条件。

第一行：平、上、去、入四声是汉语、侗台语、苗瑶语相同的声调格局，共 4 个调；

第二行：四声根据声母的清浊各分为 2 个调，清音声母为阴调，浊音声母为阳调，即由四声分化为阴平调、阳平调、阴上调、阳上调、阴去调、阳去调、阴入调、阳入调，共 8 个调；

第三行：入声调因元音长短各分 2 个调，即由阴入调和阳入调分化为短阴入调、长阴入调、短阳入调、长阳入调，共 10 个调；

第四行：又因各阴声调声母送气与否各分 2 个调，即 5 个阴声调各分化出阴平派调、阴上派调、阴去派调、短阴入派调和长阴入派调，遂形成 15 个调。

侗语舒声调和促声调的调值往往是重合的，即（以广西龙胜县侗语为例）：阴平和短阴入同为 55 调值，阴平派和短阴入派同为 35 调值，阴上和长阴入同为 33 调值，阴上派和长阴入派同为 23 调值，阳上、短阳入和长阳入同为 31 调值，即实际上侗语只有 55、35、11、33、23、31、53、453、42 等 9 个调值。

（李钊祥 1985）侗语 15 个声调是参照综合整个侗台语族语言声母、韵母、声调三者之历史对应关系总结出来的声调系统，毋宁说是语言学家的历史归纳与构拟，侗语实际调值只有 9 个，因此只有 9 个调值的 15 个调类并不具有母语人认可的“位（emic）”的意义。

综上所述侗语声调是对声母清浊、送气与否和韵母元音长短消失的补偿，也即侗语有较多声调是因辅音（声母）、元音（韵母）发生简化而导致的声调繁化现象，并未因此引起整个语音系统多样性的增加。这种此消彼长的系统调整现象在语言中普遍存在，非侗语独有，说明语言系统的有序度（或熵值）通常会保持一个常量，以维持语言交际有效性和经济性的平衡。侗语的许多声调与辅音清浊、送气与否和元音长短是互补的，如果将声调确定为“位”（调位），其他特征则为“非位”的；如果将声母清浊、送气与否和韵母元音长短确定为“位”（声位

和韵位)，则与之互补的诸多声调即为“非位”的，那么侗语也就没有如此多的声调了。

从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看，在声母清浊、送气与否、韵母长短、韵尾舒促仍未发生演变之前，侗台语原生的声调最多只有 4 个（平上去入），如果加上韵尾舒促的互补，仅有 3 个调（因入声的调值一般不独立于“平上去”调值之外），如果再考虑更早期的侗台语和无声调的南岛语具有毋庸置疑的发生学关系，可以证明包括侗语在内的原始侗台语并无声调，所有侗台语的声调应该都是比较晚近才产生的。因此侗台语共时声调的多样性似不能作为保留更古老语言多样性的证据。

五 结束语

作为人类最重要人文现象的语言和文化本质上都是极具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因此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都非常关注语言和文化个性的分析和描写。

语言学最基本的语音描写手段是通过音位的(phonemic)和语音的(phonetic)范畴，将具体语言语音系统的社会心理属性和超语言语音的生理物理属性区分开；文化人类学借用音位的(phonemic)和语音的(phonetic)的后缀-emic 和-etic，创建“主位和客位”的研究方法，用以区别站在被调查对象的角度“从内部”观察和解释一种文化，还是站在被调查对象的局外立场“从外部”观察和解释一种文化。emic 和 etic 在两个学科中的内涵和操作是基本一致的，即都需要选择不同语言或不同文化的区别性特征和羨余性特征。

人类语言学家洪堡特和博厄斯及其后继者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进一步强调和系统化，形成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的假说，但是语言相对论和文化相对论假说的发展却“同途殊归”。“语言相对论”因无法得到验证而受到语言学的冷落，仅神经语言学的实验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而“文化相对论”却构成现代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思想，该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对 19 世纪西方“我族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反动，主张平等尊重多样性文化的存在。

同时，多样性的人类语言和文化也都存在共性和普遍性的方面。语言普遍性认为不同语言的结构差异或变异不是任意的和无限的，而是要所受的一定限制和制约，语言普遍性研究即是通过语言的普遍制约机制解释语言个性差异可以允许的限度和范围。文化普世论认为，文化个体差异之上也存在超文化超民族的人类共有行为特征和普世价值取向。语言普遍性通过语言变异的蕴含关系将语言的差异性和普遍性统一起来，而文化普世论尚缺乏联系文化普遍性和文化相对性的方法论。

由于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和相似的功能，甚至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三者的普遍联系也表现在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和沟通方面。在实证研究的操作层面，分子人类学用人类群体遗传多态性的地理分布，即现代非洲人群线粒体 DNA 比其他大洲人群具有更丰富的遗传多态性，提出人类“非洲起源”说的假设，而语言学试图用人类语言多态性的地理分布证明语言起源的假设却遇到的质疑，因为人类社会性的语言多样性较之生物性的遗传多样性变异要快得多，难以用来证明相距语言起源地的时空距离。

参考文献

戴维·克里斯特尔编、沈家煊译《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 2002 年。
呼和 蒙古语词重音问题，《民族语文》2007 年第 4 期。

- 黄布凡 史兴语, 戴庆厦主编《藏缅语 15 种》,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1 年。
- 黄平等《当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新词典》,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 黄行 颜色词的语言认知研究, 《民族翻译》2011 年第 3 期。
- 江海燕、刘岩、卢莉 维吾尔语词重音实验研究, 《民族语文》2010 年第 3 期。
- 李玉 语言“通天塔”最有可能在亚洲里海——中国学者驳“语言扩散中心非洲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 年 2 月 15 日。
- 李钊祥 侗语和老挝文声调对应关系分析, 《民族语文》1985 年第 1 期。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草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5 年。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语言特别专家组“语言活力与语言濒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03 年。
-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1 届大会, 2001 年。
- 齐卡佳 在重音与声调的连续体上看史兴语, 《东方语言学》2007 年第 2 期。
- 沈海梅 族群认同: 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化, 《民族研究》2004 年第 5 期。
- 盛桂莲、赖旭龙、王颀 分子人类学与现代人的起源, 《遗传》2004 年第 5 期。
- 石林 侗语声调的共时表现和历时演变, 《民族语文》1991 年第 5 期。
- 杨亦鸣 神经语言学与当代语言学的学术创新, 《中国语文》2012 年 6 期。
- 姚小平 洪堡特与人类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 赵元任 《语言问题》, 商务印书馆, 2003。
- Atkinson, Q. D.: Phonemic diversity supports a serial founder effect model of language expansion from Africa. *Science*, 332:346-349, 2011.
- B. Berlin and P. Kay: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Boas, F.: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nd Bureau of American Ethnology, 1911.
- Chuan-Chao Wang, Qi-Liang Ding, Huan Tao, Hui Li: Comment on “Phonemic Diversity Supports a Serial Founder Effect Model of Language Expansion from Africa”, *Science* 10 February, 2012.
- Kenneth Pike, *Emic and Etic Standpoints for the Description of Behavior*, chapter 2 in *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 vol 2,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1954.
- Martin Haspelmath, Martin S. Dryer, David Gil, Bernard Comrie: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xford Press, 2005.
- Raoul Naroll: *A handbook of method in cultural anthropolog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